

重返書生生活(一)

衛挺生

——著述講學與旅遊

國父陵前痛哭自劾

南京國立政治大學校長顧毓琇一樵先生，對於昔日在立法院努力本職而未被重選膺任立法委員之各人，均一一聘任為政大之專任教授。我所擔任的功課，仍然是講解財政計政制度及其立法之用意，與古今中外財政計政制度之比較研究。

授課的時間並不加多，而薪水之計算則照戰前專任教授之最高待遇，每月六百元折算當月之貶值法幣為數甚鉅。又因南京是行憲的首都，是政治中心，而我是一個制憲的立法者，仍脫不了政治方面的關係。所以在選舉首任之行憲總統時，我仍是「國民大會代表」，也曾投過票選任 蔣中正先生為行憲的首任總統。選舉既畢，我仍繼續任中央銀行顧問，接受按月津貼，如是者若干月。

記得是民國三十七年秋，徐州與蚌埠間，國共會戰，相持頗久。後來新發行的「金元券」幣值崩潰，國內民間秩序不能維持，首都與外埠一致搶米。徐蚌會戰之國軍自動撤退。我在十一月

初離開首都。在出首都之前，我先往 國父陵寢前拜別，痛哭自劬無能，而建國無成救國罔效。遂輾轉先往上海，繼往廣州，主持小女斐宇結婚。乃與小兒泰宇同往香港，遂決計改行新的學術路線。

在香港和台灣任教

我在香港「舌耕」糊口，在幾所學校書院任課，計有華僑學校香江書院、新亞書院、珠海書院等處，鐘點費皆甚小，然而可以維持生活。但我在此時深深的感覺我的歲月如此消磨過去，甚為可惜。我應當在學術上有研究發明，長留後世。忽然想起，徐福以數千童男女東渡事，為二千餘年來歷史學上未能解決之一大問題。雖有前人假定其地為日本，而有「徐倭」、「蓬萊」等稱呼，但缺乏實物確證。因思在此問題上，覓求現代科學的解答。

在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秋，忽聞友人談及今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中保存頗多前

「日本帝國臺灣大學」遺書，其中之日文日本歷史考古學圖書相當完備。我自從公元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乙巳年）在日本讀書時有此疑問而未有答案，在一九一六年（中華民國五年）夏，在哈佛大學一度研究其問題而未得結論。在民國三十五年在重慶又一度研究，雖有答案但欠確實與澈底。現臺大之圖書館關於此問題，既有相當完備之圖書則值得作若干犧牲，一往而窮其究竟。于是，我乃向香港各學校請假，並將兒子泰宇託朋友照料，而自己赴臺灣大學作此問題之研究。

到了臺灣，臺大教授教育部司長沈亦珍博士及其夫人李兆萱女士亦臺大教授，請我住在他們的府上，待我以先生之禮。原來我曾在中央大學講課數年，而沈夫人當年曾在班中聽講課，這是意外的好遭遇，我的食住問題得了優美的解決。臺大文學院院長兼史學系系主任沈剛伯先生，亦歡迎我用史學系的圖書館。

我先檢查了該圖書館內所藏的重要日本歷史及考古書，而分別其最重要者開列書目，作有系

統有組織的研究。因為我不能在臺灣久住，所以首先請一位姓張的書店老板，代我向日本採購若干重要而必需常用的日本圖書。其未令採購的書籍，則夜以繼日的研讀而作筆記。如此三四個月，到次年（一九五〇年）民卅九年一月，我回到香港時，我對於日本傳說史（先史）時代的研究已經有了有把握的結論。除已購得一大箱的日文參考圖書外，並攜歸有一手箱的筆記稿。

這樣，我回到香港後，我並用香港大學中文部的馮平山圖書館藏書，正式寫稿。到春末夏初，我已寫成片段。

我在港大圖書館寫此問題時，港大中文系主任教授馬季明（鑑）先生，聽說我的結論，他要我在出書前，先向港大之中英文化協會發表我的結論。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該協會的書記葛璧夫人 Mrs. Ruth Kirby 來函邀請。而這一次的演講傳到日本後，却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日本學者發起了空前的一次「現代日本人頭骨指數測計」其規模頗大，其詳另見下文。

考證徐福出版專論

四月末，我的夫人醫學博士桑蘭谷從南京出



本文作者（左第二人）早年任菲律賓國立大學交換教授應菲總統邀宴時與菲總統夫人握手歡談。

來，為我帶出我昔年所收藏的圖書的一小部分共廿五大箱。並為我帶來一位很有能力的青年助手傅永安君。原來傅君想來香港，而怕來到之後找不着工作。我預先為之接洽了一位姓王的香港商人，即新亞書院之經濟支持者，同意援用他。而在傅君初到香港時，恰遇王君生意清淡，暫時不能安插。傅君遂與我同住，而助我清稿抄寫。經夏及秋，我的徐福研究已整理完竣抄寫成書，定名為「徐福入日本建國考」又名「日本神武開國新考」，乃請前駐日本大使許世英靜仁老先生寫就書簽，而以全書交香港×××印書館排印而自為發行

人。書館經理先生對此書特感興趣，處處事事幫忙。我當日自大陸逃亡至香港，窮困極了，將我新到的二十五箱舊藏書，賣出了一部份，所得的現金不够付印書費，×××印書館的經理先生乃自動的主張接收了我出版的新書一千部補充印刷費。如此在一九五〇年秋末，我的新書出版了。

新書內容的大意如下：徐福以青年方士，見秦始皇帝于琅邪，稱東海蓬萊仙山產靈芝草，食之長生不死。始皇信其說，徐福請先往觀察之，乃派往。歸言東海大神要求願得「振男女」數千人及五穀百工為贖，始允將不死之藥取贖始皇，始皇乃可其請，授權徐福徵發之。徐福乃徵發童男童女各三千人及五穀之種與百工而以樓船大隊運輸之以渡海，至福岡而停泊，暫駐十年，以農工及戰術訓練其童男女至于成人。在此十年中，徐福曾以少數人沿九州島而東南行繞九州島南四國島而入紀伊半島「倭奴人（即阿伊奴 Ainu）語謂蓬章曰「紀」*Ki*，謂萊蕪荒地曰「伊」*I*。而琅邪人入海者，意譯「紀伊」*Ki-I*。半島曰「蓬萊」。紀伊之近畿區，至今仍產靈芝菌。其為藥性微瀉，乃清血之微補劑也，故附會為「不死之藥」見其地有平原有廣澤，天然形勢甚美，因歸而返其福岡基地，乃謀東征。先自返琅邪。適值始皇又在，乃往見之，詭稱已得不死之藥而大鯨魚成羣，阻止其歸路，因而不得達，願得連弩及善射者為之開路使不死之藥得達。始皇不予連弩，而予以捕大魚具。徐福乃別始皇而南下，購得淮河流域之銅鑛而歸，遂在福岡、岡山一帶製造兵器，增建樓輪，並貯蓄糧食，然後盡起舟師而東征，幾經

周折，終得畿內磐余之權原而都之。遂建立王國，稱「大倭」，（意謂「倭奴（阿伊奴）國之大者」，以避免秦始皇之發現）。至中國唐代時，留唐日本學生返國後，乃以唐文化改造其政治教育及社會，惡「大倭」名，改其都名曰「大和」，改其國名曰「日本」，改其君主稱謂曰「天皇」，追證其始建國之君主徐王「磐余彥尊」曰「神武天皇」結論一切，皆舉實證。

此書出版後，在香港逢四明張壽鏞詠霓先生之公子張星聯君取其尊翁重印之「徐偃王志」一冊持贈，書中有徐氏世譜出自梁王僧儒之「百家譜」。余乃取金文中之徐國文獻考定之，補作「徐世家」以補史記之所缺遺，而二三十年來「徐偃王」之謎與神話，真相大明，遂作「日本神武天皇新本紀」而成「補編」，「正編」及「補編」都四二二頁約共二十四萬餘言。楊君家駱為作後序曰：「徐福東渡，止王不來，雖人人習聞。然證其地確為日本，證其人確為神武，證其事確為倭之始建國，則自衛君始。」楊君「後序」並有數事補充皆甚重要，可以使讀者增加瞭解徐福案之真實性。書出版後，除在香港有少數之行銷外，並向臺灣及日本推銷。書到日本，昭和天皇之令弟三笠宮（親王以宮稱，名「嘉仁」）首先感到興趣。因書後有「本書保留一切權利，包括翻譯權及電影權」之文。三笠宮乃輾轉託人，請求准許翻譯此書。時友人徐復觀在日本，專函來商其事。予乃立即函復，歡迎三笠宮翻譯。而三笠宮當時方在東京大學研究院作研究生，研究日本歷史。東大教員方面，有人力勸其勿翻譯，謂此

書之結論尚未成定論。同時日本國會圖書館之「中國圖書課」課長平和彥君，亦請授權翻譯。茲照錄平君之原函于次：

「衛挺先生大鑒：

關於先生所著作的「神武開國新考」，在其出版前，本人業已有些領略。去年在香港發行的「星島日報」上我早已看過您在「中英文化協會」上發表過的關於神武開國的學術演講。後來本人一直盼望此書的早速出版。同時去年九月讀過羅香林先生的介紹文以後，就在東京（內山書店）纔能購買。讀了一遍，我實在感懷此書的博引旁證，無一不在。

實在欽佩不已。可惜我只為一介書生，原無些古代史的知識，亦無法批判此書的內容如何。因此本人纔打算務必將此書介紹一般的日本讀者。幸而此次特有「每日新聞社」的囑咐，將此書的概略載于「每日情報」（月刊）雜誌五月號上，同時也要囑託本國的幾位史學專家加以批判。本人相信先生的勞作由此應該反響到日本全國。如東有了相當的響應我還要將此書的整篇譯成日本文字，再由每日新聞社發行。先生若是不嫌煩勞，務必將此書的翻譯權賜與本人。假如有了先生的承認，本人就在此四五個月內一定要完成翻譯。我想這樣的工作，纔能開發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同時對中日兩國歷史學界的貢獻也不渺。再者本人還希望您寄與此書的英文版曰「日本之誕生」The Birth of Japan 以便翻譯時的對照參考……今日許多事煩

瀆您，將來再謝您。祝您身體康健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

日本東京都港區赤坂一之一國立國會圖書館

中國資料室平和彥手啓

此信收到後不久，一九五一年五月號「每日情報」月刊專號出現，平君寄來一冊給我。在該刊中，載有平和彥先生作一篇十八頁的拙書節略，繼載有三位日本學者對於我的拙書所批評。又另覓了一位日本姓徐的一人，日本人指為徐福的後裔，徐昌道醫師，出來作證。

日本學者謾罵爭論

三位作批評的日本史學家，以津田左右吉博士為首，對於我的新說：徐福入日本近畿區內建國，傳國六十餘世後，被追證為「日本神武天皇」的學說，痛加駁斥，而且加以謾罵，謂「如此荒謬（「馬鹿」）絕倫的學說，乃從來之所未有」。原來在中日大戰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津田左右吉博士見日本軍閥方將利用日本書紀所載神武天皇天降建國在求「八紘一字」之說，將造成帝國主義之世界大戰，乃著論指稱，史稱「神武天皇東征」乃神話小話，而實無其事。日本之建國，實始於傳說史中之第十代天皇，其諡為「崇神天皇」，即世所稱之「御肇國天皇」。此說一出，日本史學家翕然景從，並認為「定論」。因其主張以「神武天皇」故事作為神話小說，事實上根本不曾存在。故以徐福為神武天皇，乃以徐福為「子虛」「烏有」之日本君主。且徐福自言赴蓬萊仙山，津田問：「蓬萊就是日本嗎？沒有任何的

確文獻可以證實！」

徐昌道自稱，其父原喜對日本徐氏上代的歷史作追溯的研究，但止能上溯六世。

在我反駁四人的批判文中，我首先指出，學術的討論，用不着謾罵，因為謾罵解決不了學術上的問題，而學術上的問題必需以正確的事證實證解決之。其次我指出，學說必需能解釋一切有關的事實，而無所謂老牌不倒的「定論」。牛頓的「定論」，愛因斯坦出而以「相對論」修正之。津田的「定論」，不能解釋歷史與考古學所得

的新事實，則必需修正。又次之我指出，我肯定徐福渡海後建國日本「近畿」區內，不是因其地名為「蓬萊」，而是因其地有「平原廣澤」，蓋自琅邪東渡海而東之各島，而有「平原廣澤」可以舟師逕達而「止王不來」者唯有日本之本島上近畿地方。其他各島，自濟州，九州以至琉球臺灣皆有「平原」而無「廣澤」。(或並「平原」亦無之)。次三，我指出，日本書紀中之神武天皇記事固多不實，然而不能因其有不實，而謂「神武天皇」無其人，「神武東征」無其事。若然則何以解釋：自福岡至于畿內外近淡海遠淡海間之各種中國先秦時代之文化物，各數以千計，埋藏于地下之考古事實？故否認神武天皇其人之曾存在，否認「神武東征」其事之實在，則考古方面先史之難于解釋，更遠甚于承認其人曾存在而其事實有，而修正其記事。于是我乃根據可信之中國史錄，與可信之日本考古記錄，而提出五十四點問題，要求日本學者答復，並謂日本學者如不能答復，則當接受我的新學說。因為在我的

新學說下，一皆可解釋而毫無疑義。

至于所謂「徐福墓」及「徐福祠」乃日本唐化以後平安京時代後期好事者之所妄指以點綴歷史風景者之所為。為徐福墓守墓之日本徐氏，當不早于明清之際。(在明亡時避清渡海之徐氏經幕府派往守墓)拙書早已推定，而徐昌道之自白，更可證明我書中所推測者之不錯。

在我反駁後，家永三郎博士代表日本學者，與我通訊討論，交換論據及意見者凡三年。

三年中之討論，舉例言之。早期家永提出，丹後函石濱地方與筑前松原地方，皆有石矢鏃與王莽「貨泉」錢相伴出土。日本學者遂謂日本在王莽時，即「公元第一世紀」時，尚在新石器時代，因而推論「彌生式」文化為金石並用之時代，其入日本當在第一世紀以後。我乃引戰國策之楚策楚莊辛諷諫楚襄王之一段話中，謂當時之公子孫尚用石矢鏃以射鳥類。莊辛與楚襄王皆公元紀元前三世紀人，在孔子後二百餘年。而孔子乃銅鐵並用時代之哲學家。然則石矢鏃與王莽錢伴出，不足以證日本在王莽時，其文化尚在新石器時代，更不能證明彌生式文化之入日本不在秦代。最後，家永又謂，「今日東亞考古學界皆謂日本之『彌生式』土器與漢民族古代之土器全異其種類與格式。無論如何，彌生式土器之源流而於漢民族求之殆不可能。先生謂『徐福彌生式文化物入日本』之高說，有誰一人能贊成之？」

我乃以二萬餘言之長函，近三十頁之圖片，詳細答復家永博士，並證明日本之「彌生式土器」，即先秦時代中國之「陶器」，其樣式同，其

花紋同。日本之「甕棺葬」，即中國晚周先秦之「卽土周葬」。日本之彌生式之「巴形銅器」與安陽出土之同式銅器為同類。日本「彌生式」之銅矢鏃，與安陽出土之銅矢鏃為同形物。日本「彌生式」之銅劍石劍，皆與安陽出土之銅劍同形。日本「彌生式」之「石庖丁」，乃與中國城子崖出土之「石粟鑿」為同物並以圖示其二穿眼之用法，為插手于帶下以截取粟穗之用。至于「彌生式」之「銅鐸」，來自中國商周時代之「編鐘」，制日本學者已先言之矣。函未乃云：

「拙著問世，皆在就正于中日學者。先生與日本任何學者，凡辱賜教，無不竭誠歡迎。如能提出具體事實以糾正拙論之錯誤，則拙作必可在評判人所提供之新事實下加以研究與討論。其錯誤之在我者，立即修正。其錯誤在對方者，將婉予解釋。因科學研究，重在求真，不重主觀之自是。敢以此意與先生共勉，若果客觀的事實證明拙著之理論並無錯誤，則亦盼先生毅然奮其大無畏之精神，接受真理而積極主張之則東亞史學之光榮也。……」

凡此類討論，外加臺灣，香港及印度巴基斯坦學者之討論，及我各別之答案，輯為一編，從丁文淵先生之提議顏之曰「徐福與日本」，交左舜生先生交嘉華印刷公司排印出版。一九五三年秋出書後以若干冊寄家永博士分贈先後參加討論及他日本學者。家永得函及書之後，以短函答謝，不作能言。三年以後，家永已以十四位名學家之編輯委員會而自為主任編輯，其新書「圖說日本文化史大系」第一冊出版。時一九五六年終時也。其書參加寫作者多為日本考古學人種學之最高權威學者。(未完)